



荣格、弗洛伊德 与艺术

〔美〕刘耀中 著

荣格、弗洛伊德与艺术

(美)刘耀中 著

宝文堂书店

1177·537

内 容 提 要

美籍华裔学者刘耀中以独特的视角论述了荣格、弗洛伊德学说和乔伊斯、劳伦斯、福克纳、海明威、瓦格纳、三岛由纪夫等二十余位文学家、艺术家的关系，视野广阔、信息量丰富，许多方面为我国学术界所未接触过。作者以精辟见解，指出中国学术文化包蕴的潜力，对开拓社会科学学者和文学青年的视野、活跃思想会多所启迪。

荣格、弗洛伊德与艺术

〔美〕刘耀中著

宝文堂书店

(北京灯市口大街同福夹道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93,000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2.5 插页2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30

ISBN 7-80030-074-9/J·15

定价(压膜): 3.6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收集了美籍华人学者刘耀中先生近几年写作的三十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篇幅不长，却涉猎很广，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浸透着真挚纯厚的情感，是作者辛勤探索的结晶，同时也反映出—一个海外游子寻找自我的痛苦心灵历程。

本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仅为读者提供一个荣格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远非完备和详尽的概貌，有兴趣深究的读者自会去涉猎有关的专著。第二部分是作者运用荣格与弗洛伊德心理学方法评介二十余位西方作家艺术家的文章。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本人就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也是文学批评的心理分析学派的开创者，并于1930年获得了歌德文学奖金。在祝贺弗洛伊德七十诞辰的仪式上，他曾这样反驳称他为“无意识的发现者”的人：“在我之前的诗人们和哲学家们就已发现了无意识，我发现的是研究

无意识的科学方法。”文学批评家们把他所发现的方法运用于分析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运用于研究作家艺术家的生平以便进而理解作品，也运用于分析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物，由此形成了文艺批评的心理分析学派。读者可以看出，刘耀中即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在评论西方作家时，他总是从研究其生平入手，通过探究作家的“心路历程”来达到对其作品的理解。他将这种方法称作“传记法”。这种方法不应被理解为以揭露作家的隐私而哗众，而应理解为通过与作家心灵的共鸣而感人。这种方法能够传达作家和作品人物的更多的心理信息，避免理论化和逻辑化的枯燥乏味，所以也许更贴近于文学艺术的本性，更富于感染力，因而也更易于丰富读者的感受。特别是由于当代许多伟大作家，如托马斯·曼、卡夫卡、乔伊斯、劳伦斯、海明威、杰克·伦敦、福克纳、艾略特、庞德、奥尼尔等，皆受弗洛伊德学说的深刻影响，在作品中刻意揭示人类深层心理的动荡，欲理解他们的作品，自然也不能回避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同时，从弗洛伊德学说中脱颖而出的荣格心理学，以其深广的文化历史内涵而独具特色，不能不强烈地影响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心理分析学派批评家的批评，进而成为

心理分析学派文艺批评的理论根据之一。读者亦可看出，荣格心理学对本书作者的影响尤为突出。本书第三部分选收的几篇有关哲学和宗教的文章，或可有助于读者加深对本书作者思想的理解。

二

刘耀中，生于1934年10月24日，广东省中山县人，祖辈属于去美国谋生的第一代老华侨。出于对种族纯洁和民族传统的重视，父亲虽生在美国，却在中山县娶妻生子，并把儿子留在家中，使他自幼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刘耀中的童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母亲不愿意让他接受奴化教育，把他从县立小学转到石歧镇的私塾，刘耀中得以读了七、八年四书五经。1949年，父亲从美国回乡省亲，但回来后三天便去世了。1950年，十五岁的刘耀中去国离乡来到美国，父亲经营柑桔种植园的家业已由他人接管。他没有钱，只能靠每小时五毛钱的打工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的反华情绪和种族歧视，使他稚弱而孤独的心灵深受创伤。他先在洛杉矶中学读书，1954年考入南加州大学攻读土木工程

专业。1958年毕业后，在加州水源局工作，曾主持加州水利工程计划，包括负责隧道、下水道、水管和水坝等工程，现主持州水源局资料室。刘耀中在加州服务三十年，并曾在英美专业科技杂志上发表过十多篇工程科技论文。为了提高英文水平，还曾在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和东方大学进修。

种族歧视的痛苦和人生旅途上孤独挣扎的艰辛，以及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在美国宗教环境中所感受到的生活的枯燥和精神的苦闷，不断地扰乱着他内心的平衡。在水源局工作后有了稳定的收入，他开始穿最好的服装，打最好的领结，坐最好的汽车……。他年轻英俊，一表人材，也开始结交极漂亮的女郎。但这一切都无法治疗心灵的创伤。他曾一度羡慕的美国物质文明，并不能使他获得心理的平衡。

刘耀中认识到，高水准的物质生活弥补不了精神的空虚，不甘于受歧视就要提高自己。于是他放弃了讲究衣著打扮，卖掉汽车，也不打算结婚了，转而埋头于学问。所幸他自幼喜欢文学，书籍成了他心灵的伴侣，读书成了他最大的嗜好。他熟读和研究了哲学、文学、宗教、心理学乃至语源学等方面的大量书籍，思想感情得以趋

于成熟。工作之余，涉猎群书，卧游环宇，与西方作家神交，其中的乐趣爱读书者自能体会。他积蓄了三千余张唱片用以欣赏研究西方音乐，收集了六千册书籍，在美国华人社会中堪称一位藏书家。但在1982年以前，他并未动笔写文艺方面的文章，他读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灵问题，为了自己精神的解脱。

1982年，上司以英语口语试不好为理由，不同意刘耀中晋升高级工程师，尽管他们完全承认他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刘耀中不是白人而是华裔。刘耀中被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所激怒，他聘请律师诉诸法律。1982年6月14日美西版《国际日报》刊登了该报记者的文章《说什么自由平等，仍难免种族歧视》。同年12月8日，《东西报》也报导了此事。

“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要用我的成绩说明我的存在。”这件不愉快的事竟成了刘耀中走上写作道路的契机。他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他写的有关西方哲学、文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文章陆续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

近年来他数次回国探亲，曾在清华、北大等大学讲学，并亲赴西藏参观考察。

三

尽管刘耀中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但他却没有停留在弗洛伊德学说上。读者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使他受惠最大的是荣格，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是荣格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及其对东方文化寄予的希望。

同那些先进的西方伟大思想家一样，荣格以其深层心理学研究成果，表达了西方文化的自我反省和价值态度的转变。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物质的每一次进步都造成另一次灾难，甚至人类的浩劫，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价值。西方人因此而陷入精神的空虚、迷茫，于是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心灵。这是对意识生活的失败所作的补偿，而这种对心灵的探索和渴求，并非传统宗教形式所能解决，而且这种现象绝不是纯粹个人的和偶然的。正如荣格所说：“精神并非来自个人，而是来自整个民族与全体人类。”

荣格深刻揭示了西方文化危机和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他写道：“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

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没有任何适当的方法，来防止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荣格设问：“中国人或印度人对我们将有何观感呢？我们在黑人之中引起了怎么样的感想呢？那些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土，用甜酒和性病（对付中国人则用鸦片）去消灭他们的人，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他把这种白人形象形容为贪得无厌、幻想到处为王的“雅利安种猛兽”。

荣格认为，只有象弗洛伊德这样伟大的理想家，才会以毕生精力担当清除西方人心理残渣的工作。弗洛伊德警告人们防止受这些残渣的诱惑，可是恰恰相反，很多西方人却珍惜起这些残渣从而更深地陷入享乐主义。荣格说，不论是站在学术的，道德的或美学的立场来看，西方人之心灵生活的伏流呈现在眼前的，并非是个有趣的画面。西方人建立的值得纪念的世界之所以醒目，是因为这一世界已表现了其本性中最丑恶的一切。

荣格极为重视东方精神对西方的影响，他提醒西方人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影响的价值。这首先是基于他对东方文化的高度评价。他指出，西方

的见神论只是对东方的肤浅模仿；东方早已熟知的显象学，西方才刚刚开始研究；西方人对性生活的研究比不上印度人的探讨；东方典籍中早已包含了富有哲理性的相对论；西方不久前提出的不定论正是中国科学的基础；在中国古文里可以找到分析心理学所发现的某些复杂心理作用……荣格作为伟大的当代西方心理学学者，甚至说：“精神分析本身及因之而出现的各种主义——不用说是西方人所发展出来的——和东方人的古代艺术比较，可以说只是一种初学者的企图。”尽管未来不可预期，而且很多西方人亦不承认问题的存在，荣格还是反复提出警告：在西方以其工业成就扰乱了东方的同时，东方亦以其精神成就扰乱了西方；西方从外部打败了东方，也许东方正从内部把西方包围。荣格并不认为东方会被西方科技毁灭，也不希望西方被东方精神毁灭。他认为“东方”深藏于人类的心灵深处，它可以消除“雅利安猛兽”的无限贫欲，从而使西方踏进精神新纪元的门槛。荣格所追求的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客观实在与主观实在以及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谐和，其中正浸透着东方和中国哲学的影响。

荣格以其分析心理学成就赢得了极大的国际

声誉，而他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态度及其对东方文化精神的探求，则曾使他象一个在晴朗的天气里报导狂风暴雨的预言者，受到西方很多人的嘲讽和唾弃。这也是刘耀中常说的“西方人永远不会原谅荣格”的原因。但是诚如荣格所言，这是一个答案在于未来的问题，而嘲讽和唾弃并不就是答案。

四

刘耀中深受荣格心理学的吸引。他觉得荣格心理学最符合他个人的心态和文化背景，可以使他获得精神的解脱。同时，荣格心理学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思想支点，使他得以更深地理解社会、人生和“这个伟大的炼金炉的宇宙”，获得对东西文化的宏观把握。

他认为，西方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酿成了三大错误：

第一、把耶稣升为神，罗马为巩固其统治，将政教合而为一，遂使西方文化日趋没落；

第二、文艺复兴提倡古希腊精神，追求真善美，而把自我、个人抬到神的位置。且看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那“人性、太人性”的基

调，耶稣也变成了一个美男子，人已被抬得过高了。尼采的《太有人性的人》(Human, all too human)对西方文化的评论即在于此。

第三、启蒙运动把理性和科学抬得过高了，以致于后来发展为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

以上三点，并不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错误，而是西方人误解了先驱者的思想；指出这三种错误，也不是否认真善美、理性或科学，而是指出西方的一种态度的错误。个人主义不应造成人的自私和自负，人应以具有个性的人参加社会集体生活，因为归根结底，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集体的个人，把个人孤立起来就造成了人的孤独。理性精神不应抑制人类艺术创造的天性和本能，科学精神亦不应以物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掩蔽人类的心灵。否则一方面麻痹了人的心灵，另一方面又放纵了人的物欲。现代西方文化恰恰造成了物质享乐的“充实”和精神生活的空虚。

荣格曾经敲响过东方的大门。刘耀中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东方的大门对于他是敞开的，因此他能够在中西文化源流中自由遐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在一篇谈三种不同的心理学的文章里，他曾说

过，美国为摆脱欧洲的支配，吸收了印第安人反被征服的民族特性，建立了福兰克林和杰弗逊开创的政教分离的传统，以政府机构来指导人们的意识生活，而以自然神论和宗教来处理人们无意识中的各种心理矛盾。中国从鸦片战争、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太平天国、以国家民族主义团结国人而向洋人挑战的义和团以至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其间连续着的共同点都在于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而与西方争雄，都是流尽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鲜血，来为西方洗出一个清白。“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绝不只是中国的事件，它是世界性的错误，是西方文化的错误，是世界的一个原始模型的伤口，是世界的阿姆弗塔斯伤口（Amfortas wound）。俄国人的心态是矛盾的，处于既非此又非彼的两难处境之中。他们抗拒帝国主义的侵袭，制造了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与之抗衡，却仍然毫无安全感可言。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等早已看出了俄国的弱点。有鉴于此，中国就需建立一个超验的社会，俾使人们能充分发展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创造新的文化成果，从而避免划一化的束缚。超验的社会是社会的内部组织，有富于高度发展的个性

的人，有因同样的兴趣或信仰而形成的团体。中国很早就有超验社会，我们的传统道德与家庭制度就是这种社会的结晶。没有个人能力的发挥，“中国文化”或许会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没有中国文化，我们或许会永远也没有家乡。

民族文化是民族灵魂的归宿。刘耀中常说：“我要寻找灵魂的归宿”，表现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深沉眷恋和对中华文化振兴的热切期望。他拥护改革、开放，赞成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中有益的内容，同时不失去我们的根基，以使中国文化能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认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这些也属于人类的原始模型，而东西文化的交汇结合，正是我们民族传统哲学双轨二元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东西对峙、恐惧的阴影依然笼罩世界的时代，他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美好的未来抱着深挚的希望。

对于国内存在的那种对西方生活缺乏体验、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而大力提倡“全盘西化”的态度，刘耀中深以为憾。他愿把自己富于真情实感的体验和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成果贡献给祖国，贡献给祖国的学者和广大青年。他说：“我不是一个学者，我只是一个工程师。我的文章只希望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他还正确地指出，欲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发表真知灼见，必得具有比较广博而精深的中西文化知识。他希望中国青年能够更加博学深思，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

五

近十年来，我国经历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和“文化热”形成的过程，这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疑将深刻影响祖国未来的面貌。它涉及到如何对待祖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重大的课题。但是，倘若缺乏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研究，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到的。例如对西方文化或西方文学艺术，就不能浅尝辄止，朱光潜先生说过：“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彻底了解西方文化的整体或是其中任何一个部门。”学海无涯，书山有路，相信读者朋友们自会下一番刻苦研读的功夫。

本书中的种种观点，读者不一定完全同意。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诚哉斯言！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作者的看法总会给我们以启发。他对“全盘西化”的批评，或许更会引起读者的同感。

《荣格、弗洛伊德与艺术》一书的出版，如能引起读者对荣格心理学的兴趣，从而更深地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更深地思考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那就足以令编辑出版者满意了。同时，这也是对刘耀中先生的爱国热忱和辛勤劳动，回报以诚挚而温暖的友情。作者、读者和编辑出版者都不是孤独的，因为海内外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在殚精竭虑地为着振兴中华而努力。

因为资料缺乏，编辑水平有限，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宝文堂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